寻访

长征路上的故事

万里长征万里歌

南风子

今年，我有一段追光之旅。

“睡到那半夜过，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又不喊百姓；只听脚板儿响，不见人做声。大家都不要怕，这是贺龙军；红军多辛苦，全是为我们。媳妇你快起来，门口嘛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

这首歌，从老人口中一出来，山风就静了。

我是在南腰界走访时听到它的。南腰界藏在武陵山深处，是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个镇，山势威猛，如剑戟林立。

当时，我正在一棵花红树下。唱歌老人说，贺龙曾亲手在南腰界栽过花红树。歌停了，山风又吹来了，树叶沙沙响，是花红树也在练习唱这首歌吗？我闭上眼睛，仿佛听见马鸣萧萧，看见征尘漫漫。1934年10月24日，红三军、红六军团在木黄会师。三天之后，10月27日，两支队伍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8000多人聚集在南腰界的猫洞大田，红旗漫卷，号角连天，有山呼海啸之势。

这歌让我着了迷。我得刨根问底。唱歌的老人告诉我，歌的发源地是桑植。

我打定主意：去桑植。红三军、红六军团会师后，从南腰界转战桑植。我之前写“红色少年诗意传奇”，写的就是两支队伍会师。如今写长征，而桑植有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

我把歌又念了一遍。我要追寻一盏灯的光。

车子开进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背倚大山，威武雄壮，如一支从大山深处走来的队伍。它的顶端，像一顶红军帽。整座建筑，如同红军的意志，坚如磐石。

馆里陈列着红军用过的武器、旗帜、军装、草鞋与蓑衣。一盏马灯，铁皮灯罩，底座漆黑，灯芯只剩一截焦黑。我站在它面前，站了很久。灯里早没了油，可我觉得它还亮着——那光不在灯芯上，在红军的心里，在人民的心里。

馆里的全息投影亮了。光影铺开，我看见一片苍茫的夜色，有山，有路，有人影在走动。有人在补衣，针线在灯下一起一落。有人把一碗水递过去，接的人弯了弯腰。有人搀着另一个人的胳膊，慢慢往屋里走。没有人说话，动作都很轻，很慢，像怕惊动了什么。

我不由念起来：“门口嘛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

讲解员看见我的神态，把我拉到一边，轻声说：“下班后，我再给你说说红色山歌。”

傍晚，金霞堆在天空。在纪念馆的广场上，讲解员讲起了《门口挂盏灯》的来历。1928年初，贺龙一行回到桑植洪家关，一个月就聚起3000多人。队伍常在夜间活动，不喊门、不借宿，“只听脚板儿响，不见人做声”。百姓便自发在门口挂起马灯，照亮夜路。后来这首歌传开了。上世纪70年代，不到20岁的尚生武跟随洪家关老艺人谷志壮学歌，第一次听到就被震撼了，从此唱起了它，一直唱到了海内外……

我拿出笔记本，把这个故事记了下来。

他又唱《马桑树儿搭灯台》——

“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我三五两年不得来……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两年不来我两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

这是贺龙堂弟、红军师长贺锦斋改写的民歌。他与戴桂香结婚，一月后便随贺龙走了。后来短暂回来几个月，再走时他说：“想我时就唱吧。”这一去，再没回来。贺锦斋牺牲时27岁。戴桂香守了一辈子，每天去坟头坐坐，摘两片马桑叶放在坟前。去世时，她留了一口木箱，装的全是马桑叶。

记录的笔沙沙作响。故事越讲越多。

他又唱《去当兵》——

“石榴开花红又红，我劝哥哥去当兵。哥当红军妹光荣，革命成功再回门。”歌短，像随口说的话。当年桑植扩红，一个姑娘对未婚夫说：“你去，家里有我。”未婚夫走了，再没回来。她终身未嫁，年年石榴花开就唱。

还有《盼红军》——

“太阳落坡四山黄，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红军回山乡。”

红军走后，女人和老人心里哼。太阳落坡，门口望。歌是盼，也是灯——

每首歌都是一盏灯。有的照着前行的路，有的守着归来的门，有的亮在等人的夜里。

听完这些歌，月上中天了。我想一个人在刘家坪走一走。

讲解员回家了。老街的石板路被磨得发亮，缝隙里钻出茸茸的青苔，绿得生机盎然。一个阿婆坐在门口纳鞋底，说她老妈讲过，当年红军坐在这石阶上唱歌。

老街尽头是干田坝。91年前的誓师大会，就在这儿开。如今种着油菜，花开得正好，金黄金黄的，像是无数的碎金粒，美得荡气回肠。那年，近两万人站在这片泥土上，刀枪如林，旌旗蔽日，震得群山回荡。贺龙站在高处，声如洪钟，大手一挥——近两万人同时出发，大地发颤……那一走，就是万里长征，就是改天换地。

我在刘家坪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到桑植的其它地方走走看看。刘洪公路把刘家坪和洪家关连在一起，路边有很多农家乐。一家小吃店的老板娘说，有一年火把夜那几天，生意火爆，光饺子皮就用了300多斤。山坡上的茶园，茶树葱茏，一层一层铺到天边。采茶人背着竹篓慢慢走。山坡上，年轻人唱着红色山歌种着茶。我感觉，他们还在种春风，种乡村全面振兴的春风。因为红色旅游的兴起，桑植这片红色热土，每天都在换新颜。我想，这些山歌也是桑植的灯，照亮桑植的发展之路。

从桑植到整个长征路，有许许多多红色山歌，可以说是万里长征万里歌。歌是最亮的灯——心灵里最亮的灯。风刀霜剑再多又如何？！如果心灯够亮，那么就会眼里有光，手上有劲，脚下有力。

如旧，常新

舒明

最近，同事、朋友们常常拿没抢到一场热门演唱会门票的事情来打趣我。玩笑归玩笑，我并不介意大家从一个侧面来了解我的——甚或也可以说是“笔会”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我们就是要和经受过各种考验的、向阳而生的创作者在一起。

“笔会”创刊于1946年7月1日。第一期的作者就是西谛（郑振铎）、茅盾和巴金。最近看到一封夏衍同志1950年2月写给周扬同志的信，里面特别说到了文汇报：“在（我党）最困难的时间（一九四六、一九四七），《文汇》是跟我们的。”这充分证明了，“笔会”的底色是左翼文化，是红的。

“笔会”创办者之一柯灵先生曾在创刊50周年时说过：“和作家、艺术家的鱼水之情，和知识界各方面卓有影响的人士的道义之交，是《文汇报》极大的荣幸，也是一种鲜明的特色。”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勉力维持这样一种鱼水之情、道义之交。

20年前，在纪念“笔会”“夜光杯”创刊60周年的北京座谈会上，王蒙先生在会上说了三个“真不容易”：“60年了，‘笔会’还大致像‘笔会’的样子，‘夜光杯’还大致像‘夜光杯’的样子，真不容易！王元化、周汝昌等先生，都是些严肃人，可在这里还能见到这些严肃人写的相对轻松的文章，真不容易！这么多年潮流没有左右它的方向，但它也不是站在潮流的对立面，真不容易！”

10年前，还是王蒙先生：“70年过去了，逝者如斯，‘笔会’无恙。版面如旧而‘笔会’常新，投稿依旧而编辑、作者、读者人事常新。”

窃以为，“大致像原来的样子”而又“常新”，既是前辈的肯定，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前不久，我们刚刚纪念了“笔会”的80周年，在报业大厦的大堂办了一个很朴素的作者手稿展。在开幕式上，前来道贺的云南籍青年作家甫跃辉特别“表扬”说，“笔会”是不改作者文字的——其实，这只说对了一部分。碰到不合适的文字，“笔会”当然要改，甚至会退稿。今年我们还引入了AI（人工智能）校对，由此查出的问题或者学到的新的知识点会及时和作者分享，收到的也都是正反馈——“学海无涯”，或者“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另一方面，通过几代编辑的带教、传承，“笔会”对新作者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年轻作者的文字，一直保持了很高的敏感度。对于他们的好文章，我们给予充分的创作自由。

非常开心的是，编辑的良苦用心，基本上都被作者接住了。“笔会”最年轻的作者之一、90后张婕，从成都给80年的“笔会”写来这么一段话：

在一众优秀的作者中，我的朋友圈文字为什么被选中，凭何立足呢？（这是个设问）因为“笔会”一直贯彻着它的发展方向：“更新，更老，更热，更杂。”对“笔会”来说，没有一种视角是不必要的，没有一种声音是不必听的，由此，我们和我们喜爱的，喜爱我们的人们，得以在这片园地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最近拜读了王蒙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办气韵生动的副刊》。最后一节“媒体与舆论”中，“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让正确的论点压倒那些稀奇古怪的标题党”这句话，读来特别心有戚戚焉。报纸副刊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非常多，而“笔会”有充分的信心一如既往地，坚定地，走下去。

（作者为文汇报笔会部主任）

文思

自助加水点

邹德斌

柏油路被“秋老虎”晒出了一层油光，油光上还晃着一层热焰。210国道桐梓县境内，我和驴友老戴背着登山包，正走得人困马乏，却见前方还卧着一段望不到头的懒坡，顿时双腿打颤。

谁知拐过一道弯，懒坡坡底处，竟是大片松林和一个可容两辆大货车错身的水泥坝子。坝子靠松林那侧，有个用砖砌成的水池，一人高、两张乒乓球桌大小，墙上用白色涂料喷着“加水5元”四字。有司机正握着从池底接出的水管，为自己的大货车加水。

我俩赶紧过去。

恰好那司机刚加完水，便把水管递给老戴，然后走到松林边的玻璃货柜前，扫了扫玻璃上贴着的二维码，付了款。接着，司机回到车上，“轰隆隆”，车开走了。

从头到尾，没见谁出来招呼一下。

老戴早已把登山包丢到水池边。淋够喝足后，整个人瘫在树荫下那把竹躺椅上，直呼舒坦。

池水清澈沁凉。我洗了把脸，溽热与疲累顿消。池子里的水，应该是从后山松林里引下来的山泉水。这才细看那只玻璃货柜：柜子隔成了上下两层，上层码着几盒香烟，搁着几包纸巾、几只花花绿绿的打火机和零零散散的纸币；下层立着七八瓶矿泉水。柜子旁边，有两把塑料椅，一把折叠椅，还有老戴坐着的那把竹躺椅，扶手用透明胶带密密缠过。

又一辆蓝色大卡车喘着粗气停到了坝子上。驾驶室里跳下个三十来岁的司机。他几步跨到水龙头前，拧开，直接把嘴凑上去。白花花的泉水灌进喉咙。咕噜咕噜喝够了，抹把嘴，才把管子插进卡车水箱口。加水间隙，他坐到那把折叠椅上，拿手背揩了揩额头的汗，一边等待一边休息。

我问他：“你认识这儿的老板吗？”

小伙子应该是这儿的常客，朝后山努努嘴：“好几个月没见着了。应该在地里忙活吧。”聊天中得知，小伙子跑这一段路四五年了，见过加水点老板几次，是个四十出头的瘦高汉子，天晴落雨都爱戴顶草帽，见了人就咧嘴笑。那汉子会往玻璃柜里添点货物，再帮忙开个水龙头什么的，然后就往后山松林那边忙活去了。

“好多师傅跑了几年，都难得碰到他。”小伙子又冲玻璃货柜努努嘴，“虽说老板不在，又只是几块、十几块的水钱、烟钱，但大家都自觉，该给的一分不少。”长途驾驶的孤寂让眼前的这个年轻司机颇有交流的兴致。那柜子里的零钱，应该是不会扫码的师傅付的现金。

水加满了，小伙子拧紧龙头，又弯腰把水管盘好，放到水池边。转身掏出手机，扫了扫玻璃柜上贴着的二维码。他把手机揣回兜里，攀上驾驶室，“轰”的一声，驾上大卡车朝懒坡冲去。

金色的秋风从后山松林里吹来，带着松脂的清香。汽车的引擎声在懒坡上发出隆隆的声响，像是大地在应和着风声。



漆画《天问》，作者黄立毅。

大地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非AI（人工智能）创作或编辑。

在红叶节上摆字摊儿

周家望

北京西郊的香山，从小到大，不记得爬过多少回了。可是在香山公园的大门口摆字摊儿，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这些天，同事们常常凑在一起，讨论怎么“办气韵生动的副刊”。上周一中午正聊着，报社负责跑公园新闻的记者小代，忽然捎来了香山公园管理处的口信儿：第三十八届北京晚报·香山红叶节开始迎客了，晚报五色土副刊能不能为登山的游客提供点儿文化公益服务？

在场的老少编辑，立刻打开了话匣子。搞征文吧，时间不赶趟儿了。组织摄影比赛吧，也不是咱爬格子一族的长项……思来想去，我说，干脆，咱们搞个“扫码送祝福”的现场笔会如何？

“扫什么码？收人家钱？”老傅问。

“哈哈，不扫付款码，请游客扫咱们微信公众号的码啊！”我把自己的想法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咱们在香山公园门口，搞个小型的书法笔会，邀请历届‘墨缘杯’书法展的入展者代表，现场给秋日登高的游客们写‘福’字、写‘寿’字，写‘红叶美’，写‘香山秀’，写他们想要的书法内容。纸砚旁边呢，咱们再放个‘五色土文苑’的二维码，让大家扫码关注，以后咱们五色土副刊的好文章、有趣的文化活动，都能随时看到。这样既服务了游客，又扩大了副刊影响，一举两得，岂不是好？”

跟香山公园管理处一商量，大家一拍即合，说干就干。周六上午9点多，香山公园东门的游客中心外，支起了两张长桌，蒙上红布围子，垫块有机玻璃板，再铺好毡子，摆上纸笔墨砚，我们这个字摊儿就有模有样地开张了。邀请来的两位书法爱好者也先后就位，一位是中国农大的退休老教授，一位是才学了一年多毛笔字的6岁小姑娘。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更何况是免费送书法的字摊儿呢。不一会儿桌子前就围了一群人，有围观的，有要字的，还有跃跃欲试要一显身手的。果然，群众里面有高手，一位七旬上下的老先生，提笔写了一个隶书的“寿”字，结字舒展，沉稳大气，引来一片喝彩。一对母女打开手机，找出字帖放大后，也来个“依葫芦画瓢”，写得津津有味。在桌旁看了许久的一个小男孩，等人少的间隙，凑过来拿起了毛笔。他父亲告诉我，孩子学书法快两年了，还没在大庭广众之下写过字，能够在这儿提笔写字，可是他成长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香山的枫栌虽然还没红透，游人们手拄登山杖，登高的热情却丝毫不减。人们在林木掩映的山道上迤逦而行，有说有笑，乐在其中。几百年的古槐之下，我们这个小小的字摊儿，也在这气韵生动的金秋画卷里，怡然自得。

在哈达铺的门槛上

高钰

我走进哈达铺老街
木门板漆面斑驳
檐下立着块牌子
“邮政代办所旧址”

我看见
1935年，他
穿着灰布军装
在油灯下翻一张《大公报》
手指停在“陕北”二字上
窗外，马蹄铁敲着石板路
嗒嗒嗒，像心跳

我站在同一扇门前
台阶棱角被磨圆了
阳光从屋檐洒下
一道光与影的界线，横在脚边
我把脚放上去

一边，石头是凉的
另外一边，还温着

门槛上有一道凹痕
凹处磨得发亮
推开门走了进去
看到老街尽头是山

山脚下，椒林红了
三百万亩大红袍，举起的火把
橄榄枝垂下沉甸甸的果实
一红一金

从《蒹葭》水畔
到橄榄成林
他推开门
门里，是他没见过的秋天
门外，是我没走过的路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程 红

一盅两件

张鸿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来广州，只当“饮早茶”就是一顿吃得久些的丰盛早餐。日子久了才明白，广州人这“一盅两件”，是扎扎实实长在市井里的老习俗。一位长辈跟我讲过，珠江码头旁最早只有一厘茶寮，简陋得很，专给干重活的苦力歇脚解渴。后来有了二厘馆，添了板凳和糕饼。坊间到现在还传着顺口溜：“去二厘馆饮餐茶，茶银二厘不多花。糕饼样样都抵食，最能顶肚冇花假。”那是晚清时。再往后商贸旺起来，有了好几层的大茶楼，老话说的“有钱楼上楼，无钱地下谋”，就是那会儿传下来的。

年轻时，周末偶尔约同事去饮茶，整间茶楼闹哄哄的。穿蓝布工服、戴白帽的阿姨推着小车来回走，车上堆满竹蒸笼。笼盖一掀，虾饺的鲜气裹着凤爪的酱味，热腾腾地扑面而来，一下子窜得满屋子都是。喝茶的大多是本地老人家，有的独自端着报纸慢慢看，有的老两口对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也有三五个老友凑一桌。周末居多的是散居在广州各处、来此聚会的一大桌家人，老的小的，热热闹闹。一壶热菊普或铁观音，水晶虾饺、豉汁凤爪、叉烧包、马蹄糕，几十种点心随心点。虾饺算得上早茶“四大天王”里排第一的，听老师傅讲，清末十三行伍家就地拿新鲜河虾做的，一代代改手艺，才有了现在皮薄透亮、褶子匀净的样子。

上下九、十八甫、龙津西路，好几家上百年的老茶楼散落在那一片。1880年的陶陶居，原先是个书院旧址，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那阵子常来喝茶。店主敬重他的字，请他题了“陶陶居”三个字，这块招牌就挂到了今天。1927年，鲁迅来中山大学教书，住文明路大钟楼，常就近去妙奇香，有空也去陶陶居坐坐，拉着许广平、孙伏园一块儿聊天，一待大半天。他爱吃妙奇香的豆豉土鲮鱼，说广州茶楼的点心清淡精巧，最适合跟朋友说说话。郭沫若路过广州去越南，在北园喝过早茶，也即兴赋出“北园饮早茶，仿佛如在家”。

这些广味，早些年全靠茶楼老板和点心师傅凭良心守着，行业里没有统一规矩，都是各凭自觉。去年我特地去恩宁路，找点心师傅冼大伯聊了聊。他从小就跟着他父亲去莲香楼。老人退休后，天没亮就揣着自己那只旧瓷茶盅出门。店里伙计跟他熟了，不用开口，到点就泡好一壶陈年普洱；等他坐下来，豉汁排骨、叉烧包紧跟着就端上桌。没过多久，拎着画眉、百灵鸟的老朋友们也陆续到了，鸟笼往窗边横杆上一挂，叽叽喳喳的叫声混着蒸笼掀开的嗞嗞声，整个茶楼热腾腾的。就算是素不相识的人拼桌，递过去一块马拉糕，也能顺着聊上几句家常。

这几年，市面上速冻茶点越来越多，价钱便宜，手工茶楼的生意被挤得难做。老师傅们一年年退休，揉面皮、调馅料、慢火焖凤爪，哪样都费时费力气，年轻人大多不愿吃这份苦，不少老街老店慢慢就冷清了。冼大伯的父亲后来也懒得出门饮茶了。

眼看着手艺一点一点往下掉，广州于是专门为早茶立了规矩：要分清楚手工现做和速冻预制的，传统点心做好以后，端上桌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这个标准听着简单，但其实把食材最新鲜的那一口给锁住了。

早茶也成了外地游客来广州一定要体验的事。有人去陶陶居、莲香楼、泮溪酒家这些老店，也有人专门找新派茶楼尝新鲜的。有的旅行社开发了西关漫步的线路，喝完茶去逛永庆坊，再亲手做两样点心，临走带盒莲蓉酥当手信。本地人谈生意也爱约在茶楼，喝着茶说话没那么硬邦邦的。街坊们更愿意去家附近的大众酒楼，一壶热茶下来，什么累都消了大半。

多味斋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